

# 97岁的母亲走进E生活

◆ 陆稚蕾

## 母亲爱读电脑信

母亲今年已97岁的高龄了。她一生生育了8个子女,前4个子女“文革”前在北京等地大学毕业后都留当地工作,我还有一个姐姐“文革”中也被学校分配去了外地,这样,母亲就有5个子女不在身边。到了今年,母亲所有的子女及配偶都相继退休了,在网络飞速发展的年代,退休在外的哥哥姐姐们为了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都向小辈们学习了电脑,现在他们都可以用E-mail给母亲写信。这样也就改变了以往写信、寄信的模式,尤其是大姐、二姐,都已年过古稀,她们再也不用跑邮局,真是又快又方便。

母亲一生没有参加过工作,一直操持家务,近年令她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隔三差五能收到各地子女的亲来信。只要闲着,她就会反反复复地读那些信,母亲已慢慢习惯了读这些没有信纸的信。但是这不能像从前那样,她自己想什么时候看就能看到了,必须等子女或孙辈们有空她才能“再看一遍”。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为了报答母亲对我们的爱,4年前我买了新房,在丈夫的支持下,将母亲接来安度晚年。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又加上我已退休,我决定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学习电脑。这时上海市政府正好在搞“百万家庭网上行”活动,参加电脑学习班是免费的,我就成了其中的受益人。后来,哥哥送给我一台半新的电脑,我就用这台电脑替母亲“执笔”,与哥哥姐姐们写信、收信。从此,母亲读信也忙得不亦乐乎。

## 母亲的郑重要求

这两年,哥哥姐姐们家中的电脑都升级换代,成了视频的。我感到我用的电脑已太陈旧,电话上网也太慢了。那天,我看到街道的活动中心有新建的“东方社区信息苑”,这也是市政府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实事。它是公益性的,在那儿上网一年才15元,不要太便宜哦!它既省了我的电费,又省了我的上网费,还有一大笔长途话费也通过QQ聊天而不用支付了。在那儿上网,自己有不慎的地方,还有网管员教,真是好处多多。我当即付了钱办了卡。从此,我的业余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去信息苑。

上海的小哥哥“闻风”给我送来了摄像头。由于北京、南昌的姐姐们每天都在网上,所以我们每天都能见面并且痛痛快快地聊天,天文地理、家长里短地聊吧,全然没有了过去打长途时的紧迫感。每天中午回家吃饭时,我都会将大姐、二姐的信息转达给母亲。母亲对我们能在电脑上“见面讲话”一直抱着新奇感。那天,我将我给二姐买的一双皮鞋带去网站,在聊天时给二姐看了。母亲听我说后,好奇地问我:“她怎么能看到的?”我不以为然地对她讲:“她能看到我的人,怎么看不到我给她的鞋子呢?”母亲当即说,什么时候她也去网站看看。我说:“那怎么行呢,活动中心的信息苑在三楼,没有电梯的,你不行的。”母亲有些黯然,但从此以后,母亲就不止一次地叫我也去买个能看人的新电脑,她也知道家里的电脑太旧了。我告诉她:“我不用电脑,在信息苑上网太合算了。”当时,我刚享受到信息苑上网的合算,满脑子都是“合算”,竟没有在意母亲的意思。

春末的天气渐渐热了,一天母亲又对我讲:“天热了,天天跑网站太累了,你还是去买一个电脑吧。”但我还是没在意。今年五一长假,北京的外孙来上海看望外婆,他随身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借助这台笔记本电脑,母亲看到了她在外地子女及孙辈的一些相片,这令她大开眼界。

五一节过后,母亲郑重地向我提出要买一个新电脑,她非常明确地对我讲:“我想趁自己的眼睛还能看时,想从电脑中看看在外地的孩子。”这天夜里我失眠了,我感到自己太疏忽了,竟忽略了母亲思念子女的感受!我天天能与哥哥姐姐们见面,母亲何尝不想呢?她比我更加想啊!这时我才想起其实母

母亲一生的岗位是“家庭妇女”,她含辛茹苦地将我们8个子女养大成人。在她近百岁之年,新时代又让她走进了E生活,我们做子女的是多么地高兴啊!



上图:老母亲与大姐在通话

下图:老母亲与外孙和本文作者一起在“研究”笔记本电脑

亲曾几次提出要买电脑,而我一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却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为她着想,顿时我羞愧万分!当天夜里我就做出了决定,马上去买个电脑,趁母亲还健在时让她也享受享受现代的E生活。

## 母亲笑得像小孩

第二天我照例去了网站,与姐姐们接上头后就将母亲的意思及我的决定告诉了她们,姐姐们对于我的决定都极表赞同,并按照我说,母亲眼睛不好,显示屏尽可能买大一点的。同时,二姐说她马上去银行给我寄些钱来。回家后,我把姐姐的意思告诉了母亲,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那天,我将电脑买来后即去登记了宽带,我知道装宽带也得要几天的时间。母亲看见电脑买来后却迟迟没有动静,就问我为何还不能启用,我对她解释了,叫她不要着急。

终于盼来了装宽带的日子。电信师傅三下五除二将宽带接上了,师傅让我验收时,我第一时间就将QQ打开,呼叫了大姐,并将视频最大化。大姐在视频中一看见母亲便十分激动地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大姐此时的声音哽咽了。我的大姐、二姐也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大姐身体不好,二姐虽然十多年前就已退休,可现在还在学校带着硕士生,她们也都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老母亲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她们少有机会回家,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与大姐通话时,我用摄像头将母亲的房间扫视了一遍。姐姐看见母亲的房间阳光充足,全新的一套家具,也为母亲晚年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

母亲关切地询问大姐的身体最近可好,血压正常吗。当大姐告诉母亲,还一直在吃高血压药时,母亲建议她不妨吃吃中药,还

说西药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药才能治本。老脑筋的母亲全然忘记了大姐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呢。但母亲就是母亲,即使子女都年逾古稀,她还把她们当孩子一样看待。母亲还对大姐讲,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在吃的方面一定不能马虎,一定不要“做人家了”。母亲说,我就是靠吃才有如此这般的好身体。母亲是“相信吃的”,她的这些老话,我们都已听出老茧来了,可母亲还是不厌其烦地关照一遍又一遍。

在这次通话后的一个双休日,大姐叫来了自己的外甥女与太婆在QQ上见面。母亲简直认不出重外甥女了。记得在母亲80岁时曾去过南昌大姐家,那时重外甥女才只有7岁,一晃17年过去了,重外甥女也已大学毕业并在大学里当上老师。母亲感叹光阴如箭。由于母亲耳背,我让母亲手握着手掌上边的小喇叭贴近她的耳朵,我将音量放大,母亲清楚地听见了重外甥女讲的“我已有了心上人了。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太婆100岁时一定带上你的第五代来为你祝寿。”这句话让母亲高兴得像小孩一样笑了起来。

这以后,母亲与北京的二姐、美国的二哥相继在电脑上见面聊天。母亲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以前母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自从有了视频电脑,她经常上午10点就起床了,精神十足地加入了我与姐姐们的聊天中。一旦有信或者有相片传来,她就会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来。我分明感到母亲比过去年轻多了!

母亲是我们家的“家宝贝级的人物”,大家都对她尽心呵护,体贴关怀。母亲在近百岁之年走进了E生活,我们做子女的是多么高兴啊!让母亲活过100岁并超过100岁,这是我们全家共同的心愿。



笔者珍藏着一本巴掌大的地图册。这本地图册是笔者在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取得的。

那是1966年10月,机关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工作组,下乡检查二季晚稻田管理和红花草播种情况。我们一行4人来到枫田人民公社,接洽之后,文书把我们安排在公社楼上客房住宿。

公社办公楼是一幢老民居。所谓客房,其实是楼上半边的通间,约莫有40多平方米,临窗边有4张木架床,后半部全都堆的是旧书,起码有1米半高,一看就知道是“破四旧”抄来的东西。对于从小就爱书的我,这自然很有吸引力。我把挎包一放,就去翻看那堆旧书。这一翻非同小可,我发现这些书竟然全部是从罗隆基家里抄来的。

罗隆基先生是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192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是我国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共产党的诤友。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长、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运动中,罗隆基被错定为“章罗联盟”,成了全国顶尖的大右派,从此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65年12月7日,他溘然长逝于北京安东大街的寓所。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枫田公社与所在大队组织人员到他家抄家,因罗的父母早已过世,四兄弟全部在外求学工作,家中只有一位年过花甲的寡居祖母。家徒四壁,生活窘迫,什么也没有抄到,只抄到这一拖拉机的书。

自从与这批旧书“同居”之后,我每次从生产队或田间回来,都要在旧书堆里翻翻看看。我发现这堆书大致有这么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罗家祖传的线装古书;另一部分是罗隆基赴美国留学前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课本、书籍、作业、论文以及《清华周刊》《新青年》《努力周刊》《向导》等一大批杂志;还有一部分是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后,盟盟正副主席张澜、罗隆基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长期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罗托人买回来的一批书籍以及国共和谈的一些文稿和盟盟的有关资料文件。我当时很年轻,从没有见过解放前的书籍、杂志、作业、文稿之类的东西,很多看不大懂,但感到很新奇,知道很珍贵。我看到罗隆基当时所用的作业本,又大又长又厚,绿色的方格,横格也特别大,全用毛笔书写,老师用朱红批改作业。当看到“多一字走样,少一字差劲”之类的批语时,心底油然而生对这位出自家乡多少少年才子的钦佩。当时我真想选几本带回来收藏,但反复权衡,还是不敢冒这个风险。

“这是些什么书呀,你老是去翻它。”一天,带队的刘组长问我。

“从罗隆基家里抄来的。”我惶惶地回答。

“罗隆基的书你也去翻?”刘组长大叫起来。“罗隆基是全国最大的右派,一贯反对社会主义你知不知道,看他的书,小心中毒!”

“不!这里还有一些进步书刊呢。”我一边解释,一边选出《新青年》和《向导》等杂志给他看封面。

刘组长用手一扬:“别看了,小周,你还年轻。你知道《新青年》是谁创办的吗?就是那个差点葬送中国革命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办的。再说,像罗隆基这种人,他会读革命的书吗?那是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惯用伎俩,‘打着红旗反红旗!’”

刘组长有一定文化,懂得国家大事,时下又是机关的革命左派,很吃香。经过他的这番“教育”,我再也不敢去翻那堆旧书了。

这些书当时为什么没有烧掉呢?据说是因为有位公社领导想把它当作罪证,在全公社搞“阶级教育巡回展览”才暂时留下的。后经讨论又觉得不妥,这么多的“大毒草”如果管理不好,会在社会上产生“流毒”,两个多月后就这批书“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但就在这之前,我们工作组完成了任务。离开公社那天,我壮着胆子在书堆里“偷”了这本小地图册藏在裤袋里。我想,它是工具书,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会很大。

这本地图册叫《袖珍中国分省新图》,蓝色平布封皮,银色烫字,上海大陆舆地学社1948年3月出版发行。分色图面,比例准确,地名标至重点乡村,每幅图都有文字说明,这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还是相当先进的,对于了解当时国内的行政区划、政治、经济、文化、物产也有一定价值。它的原主人是罗隆基先生,乃劫后遗存之物,现在其意义远超过地图册本身,所以我一直珍藏着它。

## 珍贵的地图册

◆ 周英才